责编：曾西雅 E-mail:zengxiya6225@163.com Tel:010—62806245

2015年3月30日

面对危机的美国药方：测试

□杨庆育

不论从其影响和灾难性的定量测算，不论是对实体经济的摧毁还是对人们发展信心的打击，2008年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迄今回忆起来都有抹不去的巨大阴影。当雷曼兄弟破产，美国国际集团的无限绝望，房利美、房地美濒临破产边缘，华盛顿互惠派利、美联银行、花旗银行等一批金融机构亮起红灯，多米诺骨牌还在继续朝着一个或数个方向倒去的时候，股市一年下跌40%，失业率短期迅速飙升。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的精英们在干什么？他们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以怎样相对有效的缓解方法避免了一场世界经济大地震？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政部长提摩西·盖特纳的回忆加评述的《压力测试》，展示了一幅以智慧实力实施有效抗震的大画卷。

年轻的盖特纳的职业生涯似乎与对付金融危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就任美国财长后，曾经就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金融危机进行过干预性处理。也正因如此，在美国面临金融多米诺骨牌迅速倒塌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财长这个在金融危机面前必须亲力亲为，直接面对的前线指挥官。

金融危机的最大危害特征在于，在金融系统没有修复之前是不可能让主体经济复苏的，银行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与电网一样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没有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就不能保护储户的存款安全，从而形成挤兑风险；就不能正确配置资金需求，从而形成系统风险；就不能帮助企业和个人投资，从而形成经济风险。盖特纳上任伊始就面对五枚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巨型炸弹。一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有着政府背景的房产巨头，担保了大部分美国住房抵押，2000亿美元的资助瞬时耗尽，追加2000亿美元也没有完全消除随时可能出现的灾难性违约风险。二是有着百年老店之称的AIG保险公司，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商业保险客户和养老保险客户，以及遍布全球的无数企业都要依赖它，但却处于其债务违约的险境，哪怕只是信用评级的调降都会引起大面积恐慌的地步。三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在金融世界大而不倒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成为了最大的炸弹，因此必须采取特殊手段，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临危受命的盖特纳上任伊始，除了在技术层面寻求拯救金融危机的途径外，他坚定地认为，所有金融危机都是信心危机，金融系统都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信贷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相信”，金融机构往往自称“信托”，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就会同时挤兑，储户涌向大萧条时代的所有储蓄机构，导致灾难的降临。如何恢复人们的信心的同时又能真正把握住金融机构可能爆发的危机？前财长的战略非常新颖，让监督机构去钻研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测算其将需要多少本金来度过一场灾难性的衰退。就像医生对病人进手术室前的承受力评价，其身体对手术有多大的承受力，这就是压力测试。通过测试所计算的结果，被测试单位必须筹集足够的资金填补已有的压力，如果公司没有这种自发的能力，政府就应该研究是否出手相救的问题了。然而，面对满目沧桑的金融界，压力测试或许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同样美联储官员并不愿意公开银行的具体数字，这隐藏着他们的担心，如果测试到未来损失以及预测的资本状况低于人们的预期，那么糟糕的结果也许会来得更早。美联储甚至警告：“这违反监管信息的机密性，并将对监管过程中的可信度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从更广的范围看，业内人员并不看好压力测试，他们认为测试就像一场形同虚设的粉饰污点的考试，为病入膏肓的银行系统开出一张清晰的健康状况清单。《纽约时报》的攻击更是一针见血：“这个压力测试更像是一个精心策划过的诡计，怀疑其能否得出可靠的结果。”然而，曾经有着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财长坚定地认为：“这就是关键，压力测试会是一次更严酷的检验，这将是重整金融系统的一个机制，使银行有足够的资源促进而非阻止增长。”

如果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压力测试，可以理解为将不透明的金融资产透明化，借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引起人们恐慌的不确定性，它将会帮助市场区分暂时缺乏流动性的健康银行和本质上已经破产的不良银行，它将会最大能量的动员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帮助稳固强壮或虚弱的银行。换句话说，即便没有压力测试，当金融机构的风险值达到极限也会爆发，而压力测试却给出了预先的准确预测。如果压力测试可能暴露出的问题会令人不安，但是隐蔽的定时炸弹比明摆着的炸弹更加可怕。

压力测试设计本身是科学的。首先，它分析出来的收入和损失，将会透明每家公司潜在的损失，会根据资产长期的内在价值，而非缺乏买家的市场上当前的甩卖价值进行估算，尽管这并不那么完美。其次，测试的第二部分会提供资本运动状态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都会给人们信心和正能量，如果金融机构本身要进行调整，那么测试的结果会提前告知；如果金融机构本身是健康的，那么测试会使人们充满信心。所以，结论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揭露更多的信息看起来是合理的，无论做什么，风险都会存在，压力测试会减少风险。但是，正是因为压力测试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不确定性，所以在测试前被测试主体的不确定性正好构成压力测试的风险，以至盖特纳以及美联储的团队在做精心的测试方案的同时，也在考虑着相应的措施，调整投资战略方法，尽可能确保银行最后能有足够的资本度过经济衰退时期，无论资本是投资者自愿投入还是被逼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测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美国金融机构需要多少资金，并给其自筹资金的机会。

就这样，即便是在总统对压力测试都表现出某种担忧的情况下，压力测试计划终于实施了。

测试是客观科学的，而测试的结果却是人们所普遍担心的，包括总统和财长。很明显，测试的结果可能会引发一场更大的世界经济危机，然而最终的结果没有让所有人失望，盖特纳根据结果告诉奥巴马：“我们或许可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现有资源，将调整金融系统的资本结构，被测试的19家机构中有9家是‘赢家’，有5家能快速通过自身调整而走向平衡，有问题的5家被暴露在阳光下，接下来就是问题的解决。”

《每日经济观察》随即发表评论说，“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同意”。这份由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开宗明义就说：“压力测试数据和我们的几乎一模一样！”在金融危机发生近两年之际，一直几乎被作为官方笑柄的盖特纳力挺的压力测试结果公布以后，一个有趣的情况发生了：这场危机开始消退。也由此开始，美国的复苏信号逐渐强烈，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压力测试，但至少测试给了消费者、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美国经济也从2010年开始经济逐渐攀升，2014年增长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会达到3.2%。

这场危机及压力测试给了我们以下深刻的启示。

从宏观来看，应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从本质上看，这次危机的爆发与监管缺失有直接关系，就是随后美国采取的政策也暴露出以公平择优为原则的国际金融机构管理层的缺失。

从微观上看，必须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的自律与监管。这次危机的源头，从“两房”在金融服务上的放纵以及随后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对杠杆的无限扩张和放大，既没有金融机构最起码的自律，更缺乏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

泡沫出现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和消化。信贷繁荣得益于鲁莽的冒险和过度杠杆，泡沫破灭之后的直接反应就是控制信贷、减少承担的风险和降低杠杆。政策专家和政治家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本能反应就是惩罚犯罪者，并把损失强加给他们的债权人，同时减少纳税人承受的灾难性风险。

不遗余力地坚定必胜的信心。在一场危机中，当信心消失和冒险行为停业时，如果政府措施进一步抑制冒险，就只会进一步破坏信心和触发挤兑。我们需要的是避免恶性循环，以及避免使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互相拖累的有悖常理的补救措施，如更多的私人信贷、更多的政府借贷、更多的信心，即使因为过度自信制造了混乱。危机响应者遏制金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消除恐惧来源，这意味着要防范系统性的混乱和大批公司的倒闭，确保金融机构的债权人的贷款将被偿还，并从整体上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作者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切实把握全面从严治党

□阚吉林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我们必须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必须切实改变“口头重视、实际忽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强化“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事业观，深刻认识“抓好党建是本职、抓不好党建是失职、不抓党建是渎职”，将管党治党作为首要职责，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在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积极支持纪委履行好监督责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确保抓具体抓深入。

层层落实管党治党的工作定位。党的书记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坚持“书记抓”“抓书记”。按照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个从严”的要求，明确党的纪检机关和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以及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和法、检两院党的组织的政治责任和任务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拉出责任清单、问题清单，落实工作责任，解决突出问题，发挥领导机关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的表率作用。分类明确不同领域党组织、不同层级领导干部履行从严治党责任的职责规范，抓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抓党建工作“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健全和完善考核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履行从严治党责任情况的检查考核。坚持“条条”和“块块”相结合，建立起针对各个领域、不同层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抓党建实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过程和结果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纳入政绩考核。注重党建实效考核结果运用，把敢于担当、敢抓敢管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做到任用干部看党建。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通过教育拧紧思想“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立场，增强“三个自信”，补好思想上的“钙”。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践行宗旨观念，培育担当精神，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剑，面对矛盾迎难而上，工作失误敢于担责。加强法纪教育，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纪律底线不可触碰，自觉在法律和纪律框架内开展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主流价值，以实际行动引领风尚。

依靠制度增强行为“硬约束”。制度治党是党建之本，是从严治党的保障，必须把制度建党贯穿始终。严格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党的纪律和规矩约束行为，强化党内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针对党建工作和党员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管用的制度，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努力实现思想、制度高度契合的“新常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治党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结合制度落实加强思想教育，同时将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升华、固化为制度，坚持教育和制度刚柔相济，同时发力，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形成强大合力。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除了自身修炼以外，还要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警示教育等组织生活制度，丰富和规范党内生活，创新活动方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吸引力和凝聚力。通过严肃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党员干部之间开展思想交流，通过相互提醒、相互启发，在“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氛围中，及时发现自身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氛围中，找到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之间真诚帮助，进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修养。

强化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的“五个必须”要求，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党内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监督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严格按程序、规则和集体意志办事。

督促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通过严格的党内生活，促使党员干部认识到党的纪律的严格性，真正做到守纪律讲规矩。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严格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落实。切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严格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健全和完善制度机制，从严落实各项监督措施。当前，针对权力运行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制度纪违法案件，严格责任追究。特别是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创新，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积极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坚决查办违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和单位，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落实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监督效果。根据“四个着力”的要求，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巡视工作。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完善部门之间案件线索协调会商和移送机制，完善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组织协调机制，健全重大案件的督办机制。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部署，落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各项措施，不断提高用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水平。

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惩治腐败。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全面从严治党最直接、最有效、最紧要的工作。应围绕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治病树、拔烂树，坚决查处严重违反党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徇私枉法、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厉查办在行政审批中吃拿卡要和贪污、截留、挪用惠民资金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狠刹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办事不公、行为不廉等损害群众利益、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问题，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六化”治理 推进基层善治

□陈奕威

古往今来，良法善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当政者共同的追求。基层是社会的“细胞”，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创新社会治理，推进良法善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惠州坚持“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治”，初步构建以人本化、民主化、法治化、源头化、立体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走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创新协同推进的路子。成功夺取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蝉联“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连续5年获评“中国十佳最具幸福感城市”。

突出人本化，着力提高群众满意度。社会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问题，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各项社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惠州以民生民愿为方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努力使本地人有自豪感，外地人在惠有归宿感。强化普惠性，构建覆盖全体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惠州坚持“人本立市”理念，以建设科学发展的“惠民之州”为目标，率先在全省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经过3年来的试点探索，编织了一张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的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有效缩小了城乡、县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重视差异性，做好各类群体精细化服务管理。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创建“特色之家”，对不同群体实行精准服务、有效管理，在全国率先成立“复退军人之家”，实现市、县（区）、镇（街）全覆盖，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复退军人服务管理网络，使复退军人诉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活动有场所。近年来，全市10万多名复退军人没有一个人进京上访。此外，还先后成立“流动商户之家”“出租车司机之家”“外来工之家”等特色之家，搭建各类群体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帮助的平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特定群体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突出民主化，将“由民做主”落到实处。现在基层的矛盾问题，有相当部分是因为政府“为民做主”大包大揽，决策不问实际情况，办事不问群众需求，工作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吃力不讨好”。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实现基层善治，必须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惠州倡导践行“由民作主”理念，创新推进基层民主自治，推动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在全市农村创新推行“四民主工作法”，实行“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真正让群众唱主角，有效预防了基层干部腐败不公引发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办群众最想办的事、急需办的事。通过媒体征集、群众“海选”，确定每年的“十件民生实事”。在城市社区，探索实行“社区约请”制度，社区居民自主约请市、县（区）相关部门现场办公、集中办事，做到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说了算”。

突出法治化，筑牢基层依法治理的基础。法治是实现基层善治的根本保障。惠州以推进“法治之城”建设为载体，着力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打造以“法制副主任”制度为代表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村（居）“法制副主任”制度，由市、县（区）统一聘请法律专业人员担任，实现全市村（居）全覆盖，为村（居）委会和村（居）民提供普法宣传教育、法律文书起草、依法调处矛盾等法律服务。全市“法制副主任”每年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上千宗，在促进基层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探索推行“法制副校长”“法制副厂长”制度，在博罗县试点“按法治框架解决基层矛盾”工作，在龙门县未设法庭的乡镇设立“司法惠民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司法服务延伸到基层，不断健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化解基层矛盾，解决基层问题，既要讲“情理”，更要讲“法理”，以法为纲，才能让群众信服。

突出源头化，“小题大做”化解基层矛盾。近年来，惠州坚持坚持源头防范、滚动排查和依法化解相结合，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科学决策抓防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落实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定期研判抓排查。坚持社会形势分析会制度，市每季度召开一次，县（区）每月一次，镇（街）每周一次，对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研判、早化解。探索建立“大数据督查网络”，完善矛盾排查分级台账，实行滚动排查、动态跟踪，确保及时发现新苗头、有效化解旧积案，避免形成新的积案。

突出立体化，织密平安建设“三张网”。惠州通过筑平台、建机制、强队伍、重技防，着力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健全“工作网”。率先在县（区）、镇（街）均建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村（居）和千人以上企业、学校建立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健全三级综治信访维稳平台，推动形成“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主办、部门参与、联合调处”的大调处、大综治、大化解工作新模式，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打造“群防网”。在加强警队建设、推动警力下沉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壮大“平安志愿者”、义务安全员等“红袖章”“黄马甲”队伍，全市现有各类群防群治队伍33万多人，实现了“大巡防”向“大群防”升级。织好“技防网”。坚持人防与技防并举，初步构建起全覆盖、全天候治安视频监控系统。与此同时，坚持打防结合，对各种违法犯罪敢于亮剑，重拳出击，每年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全市“两抢一盗”等刑事案件下降，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突出信息化，推动社会治理迈向“大数据”时代。惠州注重运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大数据手段实现对海量信息数据的快速收集、研判、处理与共享，有效提高了服务管理中的科学决策、准确预判、快速处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更加高效、更富成效。建立“社情民意库”，最大限度收集民意，最高效率解决治理难题。群众以网民身份通过互联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已成为一种趋势，就惠州来说，仅市网络问政综合信息平台平均每年收到网民有效来信3万件，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惠州为此整合现有网络问政综合信息平台、“惠民在线”论坛、“向书记说说心里话”论坛、党政领导信箱等各网络问政后台资源，搭建起“社情民意库”，建立了涵盖网民来信、领导批示、部门处理、督办跟进等全流程的工作机制，对社情民意实行综合归集、分类归口办理，有效减少重复和提高效率，并及时提交民意分析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真正做到了群众“有地方说话”“说了不白说”。建设智慧城市，让社会治理搭上“信息化高铁”。依托云计算技术，建起了“横向覆盖部门，纵向延伸县（区）”的一体化网上办事大厅，同时在农村推行“掌上村务”，建设“三资”监管等平台，把农村社会治理也纳入信息化轨道。以获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市为契机，突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重点，打破“信息孤岛”现象，推动各系统、各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建设一个高效便捷、全面覆盖的智慧应用服务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全面进入信息化、现代化时代。

（作者系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